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三三期 ——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3a)

-
- | | | |
|--------|-----------------------|--------|
| 【拒绝遗忘】 | 解构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神话 | |
| | ——谭合成《血的神话》英译本序 | 宋永毅 |
| 【各抒己见】 | “八五事件”答疑及《“八五事件”答疑》读后 | 冯敬兰·亦虹 |
| 【直面真相】 | 以实证研究文革 | 丁东·唐智诚 |
| 【劫后反思】 |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二十二) | 孙怒涛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拒绝遗忘】

解构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神话——谭合成《血的神话》英译本序

• 宋永毅 •

我的两位朋友——美国知名翻译家 Stacy Mosher 女士和郭建教授正计划把大陆作家谭合成先生的著作《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译成英文。可能因为我研究过文革大屠杀，他们便嘱我写一篇英译本序。我欣然接受这一任务，不仅因为谭著是强化我们民族的文革集体记忆的一部最杰出的实录，更因为它提供了解构整个毛泽东农民革命神话的最有力的思辨。

在中国共产革命的神话体系中，毛泽东的农民运动无疑是其精义大要之一。毛泽东早年以倡导北伐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和主办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发家，往后也一直津津乐道于自己是在农民问题上最终打败了蒋介石。而中共建国初期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也正是土地改革，并由此奠定了新中国的第一块基石。虽然胜利者并不等于正义者，但历史却常常是由胜利者们长期书写的。为此，毛泽东的农民运动神话的非正义性和非人性，一直较少受到学界和异议者的激烈挑战。

照理，谭合成写的是他对于1967年8月到10月发生在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的大屠杀的第一手调查实录，似乎与整个毛氏的农民运动史无关。但不无巧合的是：不仅事件发生的地点都是湖南，不少大屠杀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也都宣称他们的杀戮是对50年前毛泽东倡导的农民运动的模仿，并简称为“第二次土改”。这样，谭合成50多万字的血泪记载，就提供给了读者这样一个十分简单却令人信服的反推逻辑：如果说毛氏农民运动在它发端半个世纪后的文革（和平时期）中都还造成如此无法无天、恐怖残暴的惨案，那么在它发源的战争时期和成型的“暴力土改”的建国初期，还会有什么基本的人性和正义可言？

谭合成解构的革命神话的支柱之一，是农民运动对所谓“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斗争的合法性和肉体消灭的正义性。在道县大屠杀中，“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换句话说，90%左右的被害者是所谓的“黑五类”——地富及子女。根据美国学者苏扬的运用公开出版的三千余种县志的“保守统计”，文革中全中国农村存在着普遍的“集体屠杀”现象，至少有75—1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受害者的大多数也是“黑五类”及子女。尽管道县的杀人者在屠杀前制造了种种“地富参加造反派、准备暴动”、“要杀贫下中农”的借口，但事后证明这些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谎言。道县的受害者主体——“黑五类”及子女在文革中和文革前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谭合成的调查告诉我们：他们作为饱受歧视贱民群体非但从来没有过任何“乱说乱动”，甚至已经被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驯化到在临死前都不敢问一句：“为什么要杀我？”简言之，他们从来游离于任何派别斗争以外，都是百分之百的和平守法者。而且，“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由此，对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乃至妇女、老人和儿童的屠杀，无论在国际法、还是在中国自己的法律、甚至共产党的表面政策（如“黑五类”和子女的区别）中都不具有起码的合法性。长期以来，中国官场甚至学界中流行一种文革中“人人有错”的貌似有理的说法。但看完谭的记述，读者便会幡然醒悟：至少有一个数千万人的社会群体——“黑五类”——在文革中一点错误都没有犯过，他们是清白无辜的纯受害者。在我看来，如果说他们真的犯下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面对祸从天降式的杀戮，没有奋起反抗、保卫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和权利。

谭合成解构的革命神话的支柱之二，是农民运动中施害者身份的正统性和支撑他们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神圣性。初一看，这些疯狂的群体都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他们的杀戮还有着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使之合理化。但是谭合成的调查却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些虚假的表象。根据他的调查和引证的内部文件，这些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贫下中农”们几乎都是有前科的农村流氓赌徒，贪污犯、抢劫犯、强奸犯和虐待狂。他们杀人的动机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美好的“革命”理想，相反是出于赤裸裸的奸淫掳掠的恶欲。首先，在几乎所有的杀戮案件中，杀人者在完成了血案后都要在被害者的家里，用被害者的米面鸡鸭大吃一顿，然后把受害者的所有财物劫掠一空。其次，凡是在受害者是青年女性的血案中，几乎她们都先被强奸轮奸，后或被杀人灭口，或在他们的父亲、丈夫被杀以后强行分配给一个“贫下中农”（大多数情况下为刽子手）当老婆。换句话说，龌龊卑劣的犯罪动机在这些凶手心中早就存在了，而“革命”则是激发他们兽欲的催化剂和掩盖邪恶心灵的旗帜而已。或许，道县大屠杀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更能说明“阶级斗争”理论的虚伪性：在九千多受害者里，竟有11%左右的人的阶级成分也是“贫下中农”！经谭合成的进一步查证，这些受害者在生前大都和施害者有过私人矛盾和冲突：或者是在以往的政治运动里揭露过杀人者的不法行为，抑或和杀人者有过私人的财物矛盾。由此可见，这些施害者的杀戮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的挟嫌报复、谋财害命，根本和那一套“阶级斗争”的宏论无关。

值得一提的是：据谭著披露的内部文件，在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案制造者里，“国家干部416人，占当时全县干部总数的22.6%（县级主要领导人大多数牵涉在内），农村基层干部2767人，占当时全县基层干部的66.5%，共产党员3880人，占当时全县党员总

数的36.9%。”换句话说，道县党员干部的一半左右是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或至少是他们的从犯。这对于一个时时以“共产主义道德”来自我标榜的政党和政权是何等强烈的讽刺！而这一革命神话的嗜血本性也正在无声的讽刺中裸现。

行文至此，一个问题必然会浮上读者的脑际：这是自发的暴民运动，还是有组织的杀人狂潮？无论是在毛泽东本人对所谓的农民运动的描述里，还是文革后不少善良的读者的想象中，这些都只不过是群众的过火“自发运动”。然而谭合成深入的调查却以铁证揭示：在所有杀人个案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贫下中农”自发杀人的案件。相反，全部都有干部、军警插手的证据。我们只要稍微举出几个煽动和部署杀人的名字和职务，读者便不难想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县武装部政委、现役军人刘世斌，县委书记、县抓促小组副组长熊炳恩，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区公安特派员陈智希，红岩区武装部长王先志……毋庸讳言，这些名字和职务代表了中共国家机器的各级构成：党政机构、军队和公安人员。而在公社和生产大队一级直接动手杀人的又大都是武装民兵，他们的血腥暴虐还可以拿到生产队的津贴和最高的工分，为此引发凶手之间的“杀人比赛”。如同作者的极富洞见地的感叹：“如果杀人可以不偿命而且还是‘革命行动’，人太容易变成杀人犯了”……

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恐怕是不难的。首先，如同任何对人权的侵犯先是一种政府行为一样，道县大屠杀和文革中的许多著名的暴力屠杀案一样，完全是一种中共的国家机器行为，即政权对公民的直接杀戮。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甚至是为国家机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组织指挥和执行这些大屠杀的凶手，大都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中共的党团骨干。他们是这一国家机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论，把文革中的暴力杀戮的责任一概推卸到某种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众头上是不对的。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极大地扭曲了我们民族应有的正确的集体记忆，从而混淆了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历史界限。

鉴于这场大屠杀的组织者和执行者都曾认为他们是在进行“第二次土改”，这一文革惨案就带上了挥之不去的土改的阴影，迫使作者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和比较。读者不难发现，道县文革中的暴力和屠杀不过是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例如，道县发出杀人指令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其实不过是土改时期“人民法庭”的某种翻版。而施害者所采用的对受害者们先开“杀人现场会”斗争、再宣判，后用“刀杀”、“沉水”、“棍棒打死”、“活埋”、“火烧”等方法处死，完全是土改杀地主的全套流程。至于那些野蛮的私刑，也和土改中的暴力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还有：刽子手在杀戮受害者的事前事后，还常常公开引用他们集体无意识里深深积淀的“土改经验”。例如，加害于受害者之前，凶手们常常先追逼他们的“浮财”——有的甚至是第一次土改时埋藏的“光洋”。并欺骗他们：这是“土改政策”，交出你的钱来，便可以买下你的命。而在杀光了受害者全家以后，凶手们一定不会忘了土改的传统一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财物——包括受害者的家庭里的青年女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暴徒们再也无法从受害者那里分得土地。因为第一次土改中他们分得的土地，早已经被中共在一两年后以“农业集体化”的名义收归了国有。

谭合成的调查和采访并没有止步于文革惨案，针对每一个血案，他进一步深入调查了这些受害者到底有什么劣迹，为什么会在建国初期的第一次土改中被划分为“地主富农”。调查的结果是：如果不贴上阶级的标签，这些人非但没有“黄世仁”、“南霸天”式的臆造出来的罪恶，相反都是清白勤劳、遵纪守法的好人。他们的唯一罪行就是他们的财产达到了农村中中产阶级的水准！如同作者在谈到他的思想转化时所言：“随着历史真相不断浮出水面，特别是随着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采访的逐步深入，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经历了唐山大地震般的震撼’，不能不重新审视那些我们曾经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什么是那些被血腥的真相解构的“金科玉律”呢？无疑是毛泽东的农民运动的革命神话。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读者，都会在读

完谭合成的《血的神话》后认识到共产革命的非正义性和非人性，认识到毛泽东的革命神话与生俱来的嗜血性。

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仍然有一批忠于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的“毛派”。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呢？谭合成的调查告诉我们：至少道县大屠杀的施害者们便是这些“毛派”中的一部分。1984年4、5月——在毛泽东逝世8年以后，新的中共领导人决定派遣工作组到道县调查这一震惊中外的血案。但是，“工作组一进场，立即被包围在一片反对声中。……有的说：‘毛主席死了，还乡团来了！’有的说：‘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尽帮着地富说话？’有的不吃饭不睡觉，拼命地哭：‘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来救救我啊……’有的甚至喝农药、上吊以示抗议……”。这一反常的现象却又向读者们提供了一个简单而令人信服的逻辑：如果中国大陆不痛批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继而彻底解构他的农民运动的神话，那么再来第二次文革、重演道县惨案决不是一种耸人听闻的警言。

最后，我们都要深深地谢谢谭合成先生的勇敢，他尚身处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大陆，但为全世界的读者提供了这样一本杰出的记载历史真相并颠覆革命神话的巨著。

2014年元月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 原载《争鸣》2014年2月号，发表时作者有修改。

~~~~~

#### 【各抒己见】

#### “八五事件”答疑及《“八五事件”答疑》读后

• 冯敬兰 • 亦虹 •

#### ◇ 冯敬兰：“八五事件”答疑

（作者系北师大女附中学生，也是“八五事件”调查人之一）

问：当年学生批斗老师是普遍现象吗？

答：大约是我读初中二年级开始，人的“阶级出身”问题凸显出来，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是最好的出身，即文革中的“红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是最坏的出身，通称为“黑五类”。文革又加上了“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和后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就我所就读的中学而言，如果老师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譬如北京市特级教师），有重大历史问题（当过右派什么的），一定会被归为另类，即在批判校领导时“陪斗”。对于一般老师，譬如班主任，遭到班里学生批斗的并不多。我所在的班就从来没有斗争过教我们的各位任课老师。

问：当年普通学生对这桩暴行（“8—5事件”）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答：对于大多数学生，恐惧应该是第一反应，但认为是斗“黑帮”的革命行动，也大有人在。特别是出身好的同学。在我们组织的道歉会上，一位当年高中的学姐就说，看到校领导被游街，觉得就是革命行动。干嘛要阻拦？我看到宋彬彬去劝她们了，我可远远做不到。狂热、冷漠的

反应也有，不然不会造成校长死亡。

问：当年打死校长的真正凶手同学们都清楚吗？能说出名字来吗？如果不能说，请问他们事后有无忏悔的表现？

答：游斗校领导是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不是一场凶杀案，不涉及谁是凶手的具体问题。所以，我们强调，校长是被殴打折磨致死的。殴打是暴行，折磨同样显示出人性的黑暗。譬如一个学生没有打老师，但是她让一位副校长下跪，举双手做投降状，然后一边哈哈大笑一边给他拍照。一位校领导谢顶，有人把浸过墨汁的纸糊在他的头顶。让女老师把大花盆搬上楼梯再搬下来。还有，按卞校长的头让她喝涮墩布的脏水。胡校长一直反抗，不承认自己是黑帮，马上就被学生兜头泼一瓶墨汁，她的裙子被撕裂到胯部。这些对老师的侮辱和折磨，同样是令人发指的恶行。

卞校长作为一把手，被工作组定为“四类”干部，又遭人诬陷，已是在劫难逃。工作组进驻50天，曾组织过一次全校的批斗会，卞校长被学生用木枪你捅一下我捅一下，当场不支，发生呕吐。

顺便说一下工作组是怎么回事？工作组是文革初期取代党委领导的临时权力机构，旨在维持学校正常秩序，把运动纳入有序轨道。师大女附中是团中央派出第一个工作组的中学，直接接受邓小平的指导。他们的思路与反右派运动相同的是，在学生中抓右派（反对基层党组织、反对单位领导）分子，不同的是，在领导中分一二三四类区别对待。

工作组跟着刘邓犯了“路线错误”，镇压了学生运动，受到毛泽东痛斥，悉数撤出大中学校。毛主席号召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8—5事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是无政府状态下发生的“群体事件”。卞校长不断被学生推搡、殴打、做力所不及的劳动、晕倒后不能及时送医、太阳下被暴晒两三个小时、送往医院不能立即施以抢救，每个环节都对她的生命造成不可逆的戕害。

你说，谁是凶手？

问：您觉得学生打死的老师的悲剧根源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太大，也很复杂，根源很多，有政党的、领袖的、政治的、社会的等等，直接的根源和当时的阶级斗争教育有很大关系，血统论和等级观念，让人的情感粗糙冷硬。有的依仗出身好变得狂妄、冷酷，有的因为出身坏而变得胆小、软弱，就给了暴行蔓延的机会。

问：道歉公开后，是否感到压力？考虑到宋彬彬的身份和过往，她面临的各方压力是否更大？

答：因为是集体道歉，正面反应强烈，对我们团队是很大的鼓舞。道歉是心灵的洗涤。我本人文革中不是红卫兵，自己也被伤害，但我作为当时的在校生，校长之死很快被我们抛在脑后，这是对生命的漠视。所以我也表示道歉。那张向校长塑像鞠躬致歉的照片有我。

宋彬彬面临的压力当然很大，但是与2007年实验中学校庆时评她为荣誉校友后，排山倒海般的批评、指控和声讨相比，要好多了。这次主流反应很正面，连著名学者徐友渔也发表文章，为以往文章中采信不实传闻做论据，向宋彬彬公开道歉，其实几年前徐先生已经通过不同方式做过道歉了。他让我看到中国老三届一代学者，是有担当的。

问：你和校友们从事“8·5”事件调查有些年头了，选择这个时间点出来道歉，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答：我们没有特别考虑，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而机会是偶然到来的。1月8日，刘进等几位校友去看望金元老师，她与我们年龄相差不多，情同姐妹，在对8—5事件调查中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在金元老师家，说到8—5事件的调查，和大家今后的打算，特别表达了和老师们相聚的愿望。金元老师立即表示，还等什么？马上就可以做啊！当晚，王本忠老校长也应约而至，当场策划，确定时间。随后由刘进等校友电话邀请了二十六七位老师。本以为能来七八位就不错了，没想到基本到会了，最年长者89岁。我们还和8—5受害人家属取得联系，能来的都来了，不能与会的也说明了原因。除了刘进宋彬彬率先道歉，三位与会同学也即席发言，对自己曾经伤害过老师同学而深感歉意。胡志涛校长的女儿也是女附中学生，她做了非常好的发言，她说，8—5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近现代史的事件，历史符号不幸落在我校，一定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以历史责任感为事件作证。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每个人当时都有自己的位置和活动，都会留下记忆。今天发言的同学都是很勇敢的，我也知道很多同学还没有胆量，你不敢面对历史，你的后代也要面对。反思不会增加仇恨和苦难，反思是为了和解。她还说，母亲宽容、原谅了所有的同学，指名道姓地提到她们每一位，说她们都是孩子，从法定年龄上不能承担法律责任。

问：宋彬彬和刘进的道歉，是不是也意在澄清关于二人在八五事件中负有责任的流言？

答：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和道歉。澄清是不能缺少的。譬如说宋彬彬组织杀人比赛，打死七八个人。譬如说她领导的红卫兵打死了校长。不搞清楚事实，让她为了什么道歉呢？法庭上还允许被告自辩呢，宋彬彬对自己没有组织、参与任何暴力事件做出澄清，特别是当着熟悉她的老师同学，难道不是必要的吗？

但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宋彬彬对事实的澄清并不是对以前控诉和批判文革的质疑或否定。对以前揭露文革暴行的人，我们给予极大的尊重和肯定。

问：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应该也是你的校友，你想对她们说些什么？

答：当然，希望她们能够直面自己，公开站出来道歉。毕竟，当时她们是孩子，是未成年人，有种种理由可以为自己开脱。但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你们？心肠的冷硬、感情的粗糙、人性的不友善、心理的不正常……总是有种种的个人原因，让你成了“那一个”。

问：去年去世的曼德拉，推动了南非种族屠杀的“和解与真相”事业。与你们个人发起的文革道歉相比，你觉得国家层面的推动是否效果更大？

答：期待如此。但是对于一个没有道歉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可能要走很长的路。最近，我听一个德国学者说，对二战的反思，在德国也不是战后立即兴起的，直到60年代末，年青一代开始了对父辈的质疑和追问，你是纳粹吗？你是否杀过人？逐渐才推动了全社会的反思，推动了政党和国家的反思。希望我们的年青一代也担当起追问和推动国家、政党、民族反思的责任。

问：作为过来人，你怎么评价文革？你怎么看待当下社会掀起的怀恋文革的思潮？

答：文革是浩劫，是国家的灾难。无论对国家、政党、人民，无论对政治、法制、经济，最重要的破坏是对教育和文化的毁灭性打击。后来又缺乏认真反思，遗忘和无知，也是怀恋文革的原因之一吧。

◇ 亦虹：冯敬兰《“八五事件”答疑》读后

《“八五事件”答疑》是宋彬彬“团队”主要成员之一冯敬兰的文章。本文仅就冯敬兰在《“八五事件”答疑》中的部分陈述，写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冯敬兰：……在我们组织的道歉会上，一位当年高中的学姐就说，看到校领导被游街，觉得就是革命行动。干嘛要阻拦？我看到宋彬彬去劝她们了，我可远远做不到。

亦虹：原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6月8日在《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说：“宋彬彬是红卫兵的头头之一。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2010年，原女附中学生张敏在《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中这样写道：“最近看到宋彬彬说卞仲耘被群殴时她在现场，没有参与，还作了劝阻，对此说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如果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当时大喝一声”不要打了！“以她们标志性的地位和影响力，一定有很多同学会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当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场的大操场殴打全过程，没有人出来喝阻。”

“看到宋彬彬去劝她们了”这句话，与张敏和陶洛诵的见证是矛盾的。这位高中的学姐会被邀请参加这个道歉会，在思想上，显然是与宋彬彬、叶维丽、刘进和冯敬兰保持一致的，属于冯敬兰后面提到的“我们团队”。与宋彬彬、叶维丽、冯敬兰思想不一致的人，根本就不会接到邀请。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长的丈夫和孩子就没有被邀请。这样一个小圈子的自说自话缺乏信用。

冯敬兰：游斗校领导是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不是一场凶杀案，不涉及谁是凶手的具体问题。所以，我们强调，校长是被殴打折磨致死的。

亦虹：“游斗校领导”至“殴打折磨致死”，竟然可以用“群众运动”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按照这个逻辑，纳粹用毒气毒死犹太人也不过是群众运动而已，卢旺达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进行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也不过是群众运动而已。

冯敬兰：因为是集体道歉，正面反应强烈，对我们团队是很大的鼓舞。

亦虹：集体道歉不是遮羞布。正面反应不是开释凶手和领导者策划者。这个“团队”有没有意识到，这次道歉的负面反应也很强烈？

冯敬兰：这次主流反应很正面，连著名学者徐友渔也发表文章，为以往文章中采信不实传闻做论据，向宋彬彬公开道歉，其实几年前徐先生已经通过不同方式做过道歉了。他让我看到中国老三届一代学者，是有担当的。

亦虹：徐友渔道歉是很好的事情。不过，他是为听信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宋彬彬打死六、七或者八、九个人道歉。他的道歉与卞仲耘受难这件事情没有直接关系。

冯敬兰：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和道歉。澄清是不能缺少的。譬如说宋彬彬组织杀人比赛，打死七八个人。譬如说她领导的红卫兵打死了校长。不搞清事实，让她为了什么道歉呢？法庭上还允许被告自辩呢，宋彬彬对自己没有组织、参与任何暴力事件做出澄清，特别是当着熟悉她的老师同学，难道不是必要的吗？

亦虹：宋彬彬就“组织杀人比赛，打死七八个人”澄清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道歉信里，宋彬彬说自己在卞仲耘被打死一事上的责任，不过是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和因为“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从而没有“保护好”校领导“。她讲自己”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讲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讲她自己”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她说：”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宋彬彬说的”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这句话，听起来相当奇怪。宋彬彬和刘进无需”强势“就两次”阻止“成功，正说明宋彬彬和刘进是当时学校的领导者。否则怎会正当红卫兵残暴地殴打校长的时候，他们两个一”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围观的同学“就都”散了“呢？”围观的同学散了“，那么，那些抡着”铜头皮带“，举着”带着钉子“的桌子腿的行凶者呢？他们也散了吗？如果行凶者都散了，那么，被打的卞仲耘和其他副校长们呢？他们是特意留在那里等着行凶者回来继续殴打呢，还是已经不省人事？再说，宋彬彬和刘进凭什么就”以为不会有事了“，既然有心”保护“校长，怎么”自己也走了“呢？

1966年8月，宋彬彬和刘进都是19岁，都是女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因为正主任在8月之前已经离开女附中，所以，宋彬彬和刘进位于当时学校的权力中心，并且有他们的办公室。8月4日对同学，8月5日对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的斗争会，是他们组织和领导的。对于卞仲耘的遇难，他们负有直接的组织责任和领导责任。

冯敬兰：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宋彬彬对事实的澄清并不是对以前控诉和批判文革的质疑或否定。对以前揭露文革暴行的人，我们给予极大的尊重和肯定。

亦虹：王友琴就是”揭露文革暴行的人“。以叶维丽刘进冯敬兰为主的宋彬彬”团队“不但没有”给予“王友琴”极大的尊重和肯定“，反而通过《记忆》杂志，通过出版《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一书，对王友琴极尽攻击之能事。冯敬兰在《”八五事件“答疑》中说这句话，不是太虚伪了吗？

冯敬兰：最近，我听一个德国学者说，对二战的反思，在德国也不是战后立即兴起的，直到60年代末，年青一代开始了对父辈的质疑和追问，你是纳粹吗？你是否杀过人？逐渐才推动了全社会的反思，推动了政党和国家的反思。

亦虹：德国年青一代对父辈的质疑和追问的基础，是纳粹的罪行被彻底否定，被一一清算。没有对纳粹犯罪事实真相的揭露，没有整个德国社会对纳粹的彻底否定，德国年青一代如何质疑如何追问？

冯敬兰：我们没有特别考虑，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而机会是偶然到来的。1月8日，刘进等几位校友去看望金元老师，她与我们年龄相差不多，情同姐妹，在对8—5事件调查中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在金元老师家，说到8—5事件的调查，和大家今后的打算，特别表达了和老师相聚的愿望。金元老师立即表示，还等什么？马上就可以做啊！

亦虹：这个事情的策划者，是叶维丽。这个机会也不是偶然到来的。是陈小鲁的道歉引起的正面反应，使叶维丽看到这是一个机会。陈小鲁的道歉之所以被社会接受，是因为很多人看到了陈小鲁的诚意。然而，宋彬彬文过饰非、篡改事实的道歉，不但不能洗白自己，反而让很多人



重新审视文革这场灾难。从这个角度来看，宋彬彬的道歉，有其正面意义。不过，这种正面意义是策划者和实施者不会希望也未曾料到的。

□ 原载《共识网》

~~~~~

【直面真相】

以实证研究文革

• 丁 东 • 唐智诚 •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丁东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编者〕

凤凰历史：近期陈小鲁、宋彬彬公开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行为道歉，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我们知道在许爱晶编著的《清华蒯大富》这本书中，曾经多次提到韩爱晶为文革中打彭德怀耳光的行为做出了检讨和反省。虽然《清华蒯大富》在2011年就已经出版，但是为什么社会上却很少有人知道韩爱晶的检讨和反省？

丁东：个人回忆文革中的行为，反思、道歉的事情一直都有，并不是从陈小鲁才开始的。为什么陈小鲁特别引起关注呢？因为陈小鲁不仅仅是个人表达，而是代表八中老三届校友会群体，在一个郑重的场合向当年受过伤害的老教师们道歉。这与个人发表文章反思和忏悔，是不一样的。

宋彬彬公开道歉，受到陈小鲁和八中校友会的启发，陈小鲁直接促进了这件事。师大女附中和八中是近邻，陈小鲁也认识宋彬彬。师大女附中发生打死卞仲耘的事，让老三届学生很纠结，几年前她们募捐给卞仲耘塑像，想促成反思与和解，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次她们看到陈小鲁道歉反响很大，想把本校的事情推动一下，做得和八中差不多。

你谈到韩爱晶，他写的书我看过，也写了书评。他在书中谈到当年打彭德怀一耳光是错误的，但道歉不是那本书的重点。那本书以讲述蒯大富的文革经历为主线，兼谈他经历过的文革和对文革的认识。他对文革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丁东：文革过去四五十年了，人们对文革的看法多种多样，总的来说，对文革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坚持毛泽东对文革的基本判断，肯定文革；第二种是坚持邓小平的判断，否定文革。其基调是：文革是领导者犯错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造成的一场动乱。罪恶之源主要是林彪和四人帮，坏事是造反派做的，老干部是受迫害的。否定文革宜粗不宜细。他们在八十年代通过“两案”审判，清理三种人等组织手段，清除了文革既得利益者。第三种是主张以独立的精神研究文革。我也否定文革，但我否定的方式和一些老人有所不同。他们既要否定文革，又要对毛泽东有所保护，这就产生了矛盾。因为发动文革的第一动力，不是林彪、江青，也不是韩爱晶、蒯大富，而是毛泽东。毛泽东不发动，就没有文革。我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首先要尊重事实。我主张实证研究，不回避一切真相，尽量恢复真相，而不是以某个领导人的说法或某个集团的利益为研究导向。比如，我想正视刘少奇、邓小平文革初期的心理状态和施政方式。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他们也预感到可能对自己不利，但他们并没有保护受到冲击的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而是想把运动的对象控制在一定范围，自己就过关了。好多高级干部当时都是这样的心态和做法。

最近一二十年，一些研究文革的独立学者，一些文革的当事人，既摆脱毛泽东肯定文革的基调，也超越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框架，力图真实地还原文革的历史面貌。反思文革，总要有一个价值准绳。我主张以普世价值为准绳，以人权、法治为准绳。拿这个标准作尺度，重新检讨文革中的一切人和事，反思文革的前因后果。

目前中国，价值多元、思想分化，我尊重韩爱晶的表达权利，他可以持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我重视韩爱晶等当事人的个人记忆，他的文字披露了很多重要的史料，有些是他独特的经历，他不说，别人可能不知道，历史细节就被淹没了。所以他写的书，我比较重视。但韩爱晶对文革的看法，对现实的看法，和我不同。他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固守毛泽东的文革观，现在还是崇尚巴黎公社，拿巴黎公社的原则来衡量中国的现实。我认为巴黎公社已经过去100多年了，人类探索政治文明已经积累了更好的经验，巴黎公社不是为当代中国治病的药方。

凤凰历史：韩爱晶在书中曾经提到：“对文化革命的阴暗面，对文化革命的失败，我自己就负有严重责任！但我不是反革命！”对于韩爱晶认为判他是反革命并不公平，您怎么看？

丁东：八十年代清理了“三种人”（原编者注：“三种人”是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大学生文革中的表现记录在案，“整党”的时候也要审查党员在文革中的表现。

孔丹给陈云写了一封信，说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陈云批示：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老红卫兵当时就解脱了。而文革其他阶段的积极参与者，则品尝了苦果。

比如有一位老三届中学生翁永曦，1980年曾参与改革建言，提出了重要的意见，被中央采纳，称为“四君子”之一。他原来是《农民日报》记者，处级和局级都没干过，机构改革时直接当了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是“老三届”里第一个进入副部级的人。有人向邓小平、陈云告状，说他是造反派。结果一撸到底，万里想让他当安徽当县委书记都不行。

当时对造反派采取了严厉的政治手段。你能力再强、群众评价再好都没有用，一定要拿下。韩爱晶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对他判处有期徒刑15年，实际上出于政治需要，和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不是一回事。

凤凰历史：那您觉得像韩爱晶他们这样也受到不公平对待的造反派，还有没有必要公开地道歉？

丁东：我觉得，凡是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伤害的人，都应该得到道歉和补偿。韩爱晶打了彭德怀，当然对不起彭德怀，应该道歉。但是也要考虑，他被判十五年，当局对得起他吗？文化大革命伤害了很多，谁应该负第一责任？该负第一责任的人被供起来，让下面的追随者承担后果，这公平吗？

韩爱晶为什么不服气？他和后来的掌权者也有对比。他23岁就当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北航在文革中并没有分成两派，韩爱晶当时威信挺高的。当时打下了美国的无人驾驶飞机，国家需要仿制发动机，别的科研单位承担不了，韩爱晶主政期间，组织三结合小组，完成了这个项目。韩爱晶在大学当了两年一把手，身份还是学生，仍然靠父亲每月给30块钱

维持生活，没挣公家一分钱。河南兰考代表团来北航交流，他都不敢陪人家吃饭。他说：我是学生，要是陪人家吃席，就搞特殊化了。他让革委会里的老干部去陪客吃饭，自己到学生食堂排队买饭。他自己信奉巴黎公社原则，确实是真诚的。

丁东：当时中国，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许多人既伤害过别人，又受过别人伤害。过来人应当还原到具体环境中，弄清楚在什么问题上受了伤害，在什么问题上、什么程度上伤害了别人？对于伤害别人的事，应该道歉。但是只能承担他应当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宋彬彬道歉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人觉得宋彬彬的道歉不符合他的预想，于是发出了激烈的质疑。我觉得，宋彬彬能走出这一步，应当支持。

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三人在1966年6月2号贴出师大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现在已经没有底稿了。没有证据表明这张大字报有诬陷或致人死地的内容。据她们回忆，就是给校领导提意见，说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催促学校运动的运动跟上形势。当时师大女附中只有她们几人是学生中的党员，她们想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当天受到学校党支部的批评。第二天胡启立支持了她们，接着工作组进校，她们成了工作组依靠的对象，原来的校领导就靠边站了。刘进、宋彬彬现在为当时贴大字报道歉，是一种反思文革的实际行动。

在8月5号卞仲耘被打死这件事情上，她愿意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就是劝阻不力，制止不了。我觉得这符合当时她们的身份和学校的情况。7月下旬，毛泽东决定工作组撤出。刘进和宋彬彬作为学生代表会的负责人，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权威。因为工作组支持过她们，工作组已经被否定了，她们说话也不灵了。她们当时未必认为校领导是好干部，但是不赞成对校领导实行武斗。她们劝阻了，但是说话不算数。后来卞仲耘被打得不行了，送到医院抢救时，宋彬彬也参与了，努力了。直到晚上8点55分卞仲耘去世，她都在场。她那天的实际情况，师大女附中好多人人都知道。让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负主要责任，知情者认为是不真实、不客观的。

打死卞仲耘的是不是红卫兵呢？据我了解的情况，师大女附中虽然在七月底八月初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很边缘。8月5号打人的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参与暴力的女生，不论是高一的，还是初中的，她们当时还没有红卫兵身份。但是那几天形势变化特别快，8月5号没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学生，可能几天后就参加红卫兵了。

818宋彬彬她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的姓名，引出了“要武”的说法，这话传播出去，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宋彬彬今天能够反思到“要武嘛”这句话“激发了疯狂”，“造成了生灵涂炭”，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她的反思是不是可以更加深入，这是一个可以交流、切磋的问题。

还有人认为，这一次师大女附中的道歉活动，背后是不是官方的操纵。这是不了解情况的猜测。我研究文革已经20年了。20年来，我深知研究文革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民间为了恢复真相、保持记忆、穿越遮蔽，点滴努力都非常艰辛，官方从不鼓励。

凤凰历史：有人说陈小鲁、宋彬彬公开道歉是为了出风头，您怎么看？

丁东：社会上有一种意见，说老红卫兵什么便宜都要占到。我认为，无论是陈小鲁还是宋彬彬，他们的初衷不是这样。老三届已是60多岁的人，老三届的老师最年轻的将近80了岁，有的已经90多岁，当时的校长基本上都去世了。现在再不道歉，达成师生和解，就会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

还要指出的是，这次推动师大女附中道歉活动的老三届校友，以及一直主张还原历史、澄清真相的人，大部分并不是高干子弟，不是红二代，冯敬兰做了很多工作，她当年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顾绶是顾颉刚的女儿，当时也是受压抑的学生。她们觉得自己是历史的亲历者，了解情况，就应当澄清真相。同时推动宋彬彬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是你的责任要道歉，不是你的责任也应当澄清。

宋彬彬过去觉得很委屈。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此前流传一些说法，让人感觉宋彬彬就是打死卞仲耘的凶手。这个问题，应该澄清。

更重要的一件事，2007年，师大女附中举行90周年校庆时，评了90个杰出校友，宋彬彬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展览和纪念册，把卞仲耘的遗像和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照片放在一起，又没有作出到位的反思。让人感觉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是值得炫耀的光荣历史。这就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也提出了抗议。这就宋彬彬推上了风口浪尖，放了非常尴尬的位置。实际上宋彬彬并没有参加校庆活动的具体筹划，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宋彬彬本人在文革中那么出名，成了一个符号性的人物。她的父亲宋任穷，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上有人对权贵不满，很容易投射到宋彬彬身上。如果她有陈小鲁的魄力，敞开心扉，有一说一，可能早就摆脱了尴尬。她公开面对媒体太迟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传言，使她十分纠结。家庭和亲属，对她面对媒体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不像刘进那样坦然。这次师大女附中的道歉活动，舆论对刘进比较认可，争议集中到宋彬彬头上。人们对她有不同的猜测和引申，这是很难避免的事。

凤凰历史：但是大家很疑惑的是，真正打了卞校长的人并没有站出来道歉，这里有什么隐情？而且为什么在道歉或者反思中，很少听到有人亲口承认自己比较严重的污点，比如承认“是自己亲手打死或打伤了某某”？

丁东：亲自伤害人而道歉的也有，不多。老鬼在《血色黄昏》中承认1967年批斗胡耀邦的时候，担任押解的角色，伤害了胡耀邦。他的书出版后托人送给胡耀邦，胡耀邦后来给老鬼捎过话，意思是给我的书收到了，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最近也有动过手的人表示反思和忏悔，但不很普遍。有人有顾虑：如果你公开承认打过人，别人可能怀疑你杀了人；你承认和一个人死亡有关系，别人可能怀疑十个人死亡和你有关系。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还不是一个完善的法治环境，受到指控的人，有没有充分的辩护权利？是实际问题。所以我对那些有顾虑的人表示理解。现在的大环境，还不能保证真相与和解。西德总理勃兰特出面道歉，南非总统曼德拉主导真相与和解，他们掌握了最高权力，可以掌握事态，不至走偏，我们情况不同。我们目前只能在个体心灵和道德的层次上寻求救赎。认识到自己不对，表示道歉、忏悔和反思，就迈出了历史的阴影。但是我们不能强求别人。

凤凰历史：在近期的文革道歉潮出现以后，您认为现在对文革的反思还有哪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吗？

丁东：对文革的反思，目前主要是民间正在做，研究的动力在民间。一些人曾经有官员身份，是从官位上退下来以后才参与反思。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已经年纪越来越大，有一种历史的紧迫感。反思文革，当事人和后来人做起来是不一样的。因为文革太复杂。从1966年到1967年，老红卫兵、批资反路线的红卫兵、造反派、军代表、工宣队、军宣队，革命动力一茬一茬地换。过来人研究文革，或许对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能有比较贴切的理解，后来人往往

很难理解。最近这二十多年，文革的相关信息受到屏蔽，复杂的情况很难得到充分展示，更缺少讨论的空间，后人容易把文革想得很简单，非黑即白。

80年代邓小平从政治角度考虑，主张“宜粗不宜细”。当时如果算细账，清理谁害过人，谁害过人又受过害，不太好办。因为既受过害，又害过人的干部太多，他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扯不清了。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不是始于文革，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后来有延安整风。1959年毛泽东决定整彭德怀，中央全会的会场跟文革批斗会也很相似。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价值就在这里，他把党内高层氛围和逻辑呈现出来了。

凤凰历史：我们看到某人在文革中的死因，总是遭“迫害致死”，这里迫害的主体可能有很多？

丁东：文革中，处于无政府状态，由青年学生或者基层群众打死的人多，还是有组织的迫害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多？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红八月”，红卫兵破四旧，把所谓地富反坏右赶回原籍，确实使一些无辜者致死致伤。北京郊区大兴的惨案，则不是红卫兵的自发行为。而是基层政权主导的暴行。1967年在湖南道县及其周边发生的致死数千人的惨案，也不是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自发行为，而是在地方人武部主导下，公社、大队两级政权的暴力行为。他们在当时鼓吹阶级斗争的形势下，要来一次土改重演。道县杀人为什么杀得多？因为“地富反坏”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基层政权组织掌握生杀大权，大开杀戒，很可怕。后果比青年学生针对某一个校长、老师的暴力行为严重得多。

“清理阶级队伍”伤害人也很多，这是从上往下部署的运动。搞运动就会导致“逼供信”，精神压力太大，有人就自杀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的过程中，死人也不少。

1969年召开中共“九大”，完成了权力更叠，为了重建秩序，就要杀一批政治上有异议的人。遇罗克、王佩英都是1970年春天被杀害的。那一年处决的政治思想犯很多。当时已经砸烂了公检法，政法方面由军管会主持，仍然是官方主导的国家机器在行使专政职能。

□ 原载《凤凰网历史频道》

~~~~~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二十二）

• 孙怒涛 •

〔上接zk1402c，第八章 留校任教但文革仍在继续（1968.10—1980.10）〕

## 第二节 滑稽的整党：群众把党员的关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还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文化大革命，几乎把所有的人都斗了个遍，有的甚至斗上几遍。今天这是拨人斗那拨人，明天是另一拨人斗这拨人。文革中，除了老牌的黑五类，基本上是谁都整过人，谁也都被人整过。

斗完走资派，斗群众里的阶级敌人（清理阶级队伍）。斗完阶级敌人，就要对普通党员整一

整、烤一烤了。

像我这样的普通群众，在专门整党（基本上是整党员）的运动中，并非是运动对象，不会挨整的。群众在一旁，不光悠闲地看热闹，手里还握有一定的权力——要是多数群众对某党员的检查不满意，通不过，那就要重新检查，直到群众满意为止。这叫“开门整党”，群众成了党员是不是能过整党这道关的把门大将。

世道变得真的是好快呀！“九评”学习的时候，教研组的老师来听我的检查，现在是我听教研组党员老师做检查。哪里是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才七八年就来了个轮回！

现在轮到整党了，这个时候的党员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没一点精气神了。

尤其是在公开检查阶段，每个党员都要谈错误，说认识、挖根源、查危害。有检查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有检查忘了本的，有检查自己名利思想比较严重的，有检查自己不敢得罪人、老好人思想比较严重、斗争性不强的，有检查自己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的。每人的检查都要是挖空心思，都是斟字酌句的。既不能写得太深了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过不了关，也不能检查得太肤浅了给人以浮皮潦草不认真的印象也过不了关。

当众检查时候的临场发挥、现场表现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表情凝重、声音低沉、眼泪汪汪，能让大家感觉到他的心情是多么的沉重，认识是多么的深刻，那就会比较容易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在群众评议阶段，就容易一次通过。如果声泪俱下、泣不成声、捶胸顿足、哽咽不已，那说明是真正触动到了灵魂的深处，叫做“感情出来了”，群众点头通过绝对没问题。要是检查的时候表情呆板、语调平缓，声调单一，连心里难过的样子都没装出来，既感动不了自己，当然更感动不了群众，对不起，准备再来第二次第三次检查吧。

记得有一位调干出身的党员，他检查自己在车一个薄杯形零件的时候是用一段铜棒一点点扣着切削而成的。他说，绝大部分的材料就这样都浪费了。要是这些废弃的材料买成米，该有多少斤？一家子能吃多少天？他算了一本帐，痛哭流涕地说自己也是穷苦出身，这是忘了本呀！

一个普通党员，在那个时候，只能这样检查才能过关，重新登记，其他的捷径是没有的。

幸好我们教研组的党员老师，出身一般都不是很差，也没什么历史问题，所以，虽然也不全都是检查一遍就通过，最后都比较顺利地过了关<sup>1 1 4</sup>。

教研组里的老师，给我讲过课的，我当然认识、熟悉，但是并不知道底细。至于没任过课的，此前我连名字都不知道。对于一个刚分配到教研组来的毕业生，除了旁听受教育以外，没什么说话的份儿。

我们教研组的工宣队员是一位四十开外的女师傅，看上去为人蛮亲和的。不过批评起这批老师来，不讲情面，有时候还真能一针见血。

她说，你们这些大学教师，每天上班就只把自己眼前的一尺见方的地方收拾一下，别的都不管的，哪像我们工人上班都是全车间打扫？全局观念就是不如我们工人阶级。说得大家红着脸，哑口无语。

### 第三节 毛泽东 7·28 召见讲话，我的解读和思考

大约是在1968年年底，我看到了一份手抄的毛泽东7月28日召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的讲话稿。我把讲话稿抄在专门收录毛泽东未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稿、诗词等的专用笔记本上了，至今还在。这稿子比后来韩爱晶整理发表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要简单得多。不过，有关清华两派的谈话内容基本精神是一样的。

毛泽东的这次召见，非同寻常：

1．突然而定：“7月28日凌晨2时多，住在中南海而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发生在清华大学的严重流血事件，毛泽东听后，惊奇之余，大为恼怒，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当时，毛泽东再也无法入睡了，他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的湖南厅召集会议，开始着手处理这一事件。”可以想象，那么多的中央首长凌晨时分被红色电话机的铃声惊醒，揉着惺眼，带着睡意，心中不知道有多忐忑不安呢！

2．空前绝后：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召见五大领袖；毛泽东以下全部党政军首脑（除极个别如张春桥可能不在京的以外）悉数出席；召见时间比一般接见外宾还长许多的五个半小时；主要话题是清华的两派及其武斗以及由此引伸的教育革命等；对414这样一个群众组织明确的表态和对《必胜》的严厉批判。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此后也不再有的罕见举动。

3．意义巨大：这次召见，决定了团派和414的命运，也决定了全国造反派的命运。红卫兵、造反派走下了文革的舞台，文革初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结束。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成为新的文革主力军。

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明确地说：“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

当我看到这里，立时感到满腔的悲愤，犹如五雷轰顶、天旋地转一般的不能自己。我心里对着远方敬畏的神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一心一意用生命来捍卫您，捍卫您的伟大思想，捍卫您的革命路线。我们好几位414战士甚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您怎么能说我们414是反对您的呢？您要我们把火热的胸膛剖开让您看看我的心吗？那里面是一颗无限忠于您的红心啊！我们知道您对蒯大富是支持的，偏爱的。我们之所以成立414，是因为蒯大富他确实有错，他执行您的路线过左了呀！如果不是有人在您面前歪曲事实，搬弄是非，您一定会明白我们才是您最忠实的红卫兵！苍天啊！”

一想到在伟大领袖的眼里我们竟然是反对他的，他竟然那样的厌恶我们，我沮丧极了，难受极了，绝望极了！我甚至这样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悔不该拼死拼活地搞这个414！

这份讲话稿对我的刺激实在太深了。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多次研读过它。尤其是涉及到清华的，每隔几年读一次，都会有一些新的理解、新的感受。尽管我不是七二七的亲历者，更没有七二七的内幕秘闻可爆，我还是很想谈谈自己对这次召见讲话的看法和思考，其中也有一些主观的臆想和猜测，算是一家之言。

## 1、毛泽东为什么那样反感414

从这篇召见讲话中，可以明确看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他反感《必胜》所表达的“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观点。

我在本书上一章中已经谈到了《必胜》本来的观点只是“414打天下，414坐天下”

或“4 1 4 为主打江山，4 1 4 为主坐江山”。是毛泽东硬要上纲上线，把《必胜》的要害说成是“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他对“打天下者不能坐天下”的论调非常反感，说：“清华4 1 4 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4 1 4！”

为什么毛泽东那么反感“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观点，借召见之机，借《必胜》之题，要痛加批驳呢？那是因为这样的论调深深触动了他的敏感的神经，触犯了他的忌讳。毛泽东本来就是农民造反派的头头，是他造了国民党的反才打下这座“共和国”的江山。毛泽东更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打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才坐上天下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论调岂不是从根本上全盘否定了他坐天下的合法性、正当性？对这样一种从根基上、理论上反对他、反对现政权的言论，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毛泽东看到《必胜》就龙颜大怒，一再声言“我不高兴”也就不奇怪了！

胜者为王败者寇。打天下者坐天下，这是历朝历代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的基本规律。一个敢于造反的首领，率领一群文武左右，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王朝。于是首领成了开国皇帝，文武左右成了开国元勋。他们打下了天下，也要世代代坐天下。毛泽东（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林彪等文臣武将）在“无产阶级”外衣下根深蒂固的“打天下坐天下”思想观念反映出所谓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本质上依然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而已。

在我1967年批判《必胜》的时候，当时只担心《必胜》会传到江青那儿，没想到竟会传到毛泽东那儿。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召见讲话稿的时候，心里对周泉缨怨恨到了极点，以为是他让毛泽东对4 1 4 产生了误判。实事求是地说，把毛泽东反感4 1 4 的责任全部推到《必胜》、推到周泉缨头上，是有失公允的。毛泽东并非完全是因为《必胜》才反感4 1 4 的。但是，因为《必胜》，无疑加重了毛泽东对4 1 4 的反感。由于《必胜》貌似很有理论性，这让毛泽东认为4 1 4 反对他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有理论支撑的。

其二：他反感4 1 4 的“红线主导”论。

与团派提出的“彻底砸烂”论相对立的是，4 1 4 提出了“红线主导”论。这是四一四思潮最基础的理论。

要是在文革前，尤其是毛泽东被政治上的对手攻击的时候，譬如像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刘少奇咄咄逼人的攻势搞得有点招架不住的时候，谁要是提出建国以来的成就是伟大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红线为主导方才取得的这样一番宏论，毛泽东一定是非常领情的。当年，林彪就是因为在大会上毫无保留地对“三面红旗”给予最坚决的支持，给毛泽东以最及时的援手，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当即把唯一一个“很好”的赞语给了林彪。4 1 4 的“红线主导”论本意是为毛泽东解放以来的英明领导和伟大业绩歌功颂德的，但是在文革初期提，实在是提得不是时候。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由就是多条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文革初期，毛泽东对刘少奇正处于攻势，毛泽东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将刘少奇苦心经营的地盘彻底砸烂！而4 1 4 提出的“红线主导”论，在毛泽东看来，既有为刘少奇评功摆好的嫌疑，又在否定他发动文革的必要性，妨碍他彻底摧毁刘少奇的势力。

毛泽东说：“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4 1 4 就不赞成，4 1 4 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毛泽东既说要“彻底砸烂”，实际上他又承认并非完全“彻底砸烂”。究其清华团四两派恶斗的原因，这种悖论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对团派“彻底砸烂”论表示赞赏和支持，实质上就是他对



4 1 4 “红线主导”论的反感和否定。他以为蒯大富只要把“彻底砸烂”的意思向4 1 4解释清楚了，4 1 4就驳不倒他了。他把4 1 4看得忒弱智了！如果说，蒯大富的“彻底砸烂”是“彻底砸烂旧清华”，那么毛泽东通过文革要彻底砸烂的是“彻底砸烂旧中国”（十七年来被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把持的那部分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欣赏、支持蒯大富“彻底砸烂”的根本原因。

其三：他反感4 1 4搞抬尸游行、炸高压线。

沈如槐承认：“派人炸高压线的电线杆是我在武斗中最愚蠢、最缺乏理智的决策，也是一种犯罪行为。这次行动……导致清华园及中关村部分地区停电四个多小时，给国家财产和人民日常生活带来了损失。”我能理解沈如槐当时的心情。为了营救科学馆被团派火力封锁的一百多名4 1 4人员，才出此下策的。但是，情有可原，法理难容啊！因为这，让毛泽东反感4 1 4，我认了，4 1 4错得无话可辨。

至于“抬尸游行”，这算什么错误？当4月29日谢晋澄（自9）被汽车碾压而死的时候，“4 1 4抬着谢晋澄的尸体在清华游行”。那时，4 1 4还顾及毛泽东的一点颜面，没抬尸到天安门去游行。但是此后两个多月来，中央不仅没出面制止武斗，武斗反而不断升级。7月4日、5日、6日连着三天，都有老四被冷枪射杀，4 1 4才在万分悲愤和极度绝望之下抬尸到天安门游行。这说明4 1 4对中央还寄托着最后的希望，敦请中央快快出手制止清华武斗。是的，在毛泽东看来，在庄严神圣的天安门广场上搞抬尸游行，那是丢了社会主义中国的脸，丢了文化大革命的脸，丢了他这个伟大领袖的脸，造成了很坏的国际影响。为此，他非常反感4 1 4。我要说，他反感4 1 4是没有道理的。要说丢脸，是他自己在丢自己的脸！他发动、领导的文革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是他丢了中华民族的脸，丢了中国人的脸。4 1 4的抬尸体游行，只不过是无意中把丑陋的、残暴的文革之脸向世人、向外人展示了冰山一角而已。

得益于通天的“井冈山报”，领袖对4 1 4的恶行一清二楚。至于团派的恶行，领袖概不知情，偶尔从别的渠道知道一点也以小将犯错误宽宥之。团派有这样的领袖撑腰，怪不得能肆无忌惮了！

其四，他反感4 1 4反对中央。

当毛泽东说：“我才不高兴那个4 1 4。那个4 1 4是反对我的。”江青马上接着起哄说：“4 1 4是反对我的。”跟屁虫谢富治接着江青说：“4 1 4也是反对我的。”江青在别处插话时还说：“我说4 1 4，你们不是必胜吗？4 1 4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

一个小小的4 1 4，竟然反了毛泽东、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中央文革，还反了没吭声的陈伯达，差不多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4 1 4都反了，真够罪大恶极的。

这里，只有谢富治说4 1 4想反他，我们是认的，没冤枉我们。反康生、反陈伯达，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并不代表4 1 4。对江青，我们不满，但是没反她。至于对周恩来，4 1 4对他一向是敬仰的、感激的，要说反总理，完全是江青别有用心的恶意中伤和挑拨！

其五，他反感4 1 4右倾保守。

早在1966年8月初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知道蒯大富其人了。那时，蒯大富是一个被王光美的工作组、被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迫害的典型。毛泽东用这颗炮弹狠狠地炮打了刘少奇，把他拉下了马。在张春桥的授意下，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

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这为毛泽东的文革大业又一次立下了大功！蒯大富是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将，是学生领袖，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这些在毛泽东的心里是已经定格了的。

4 1 4 是 1 9 6 7 年 4 月才产生的。作为革命左派的对立面，天生就注定了是个“右”派（好听一点叫“保守派”）的命运。江青说：“甚至 4 1 4 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蒯大富是革命左派，深得毛泽东的偏爱，正红得发紫，4 1 4 右倾保守，既没有为毛泽东建立寸功，反而不断地找蒯大富的麻烦，4 1 4 凭什么讨毛泽东的喜欢？凭什么让毛泽东不讨厌？

这次召见，这篇讲话，让我们第一次直接地听到了毛泽东对 4 1 4 有那么大的不满和反感、那么深的厌恶和怀恨。

相比较蒯大富做了好几件令毛泽东欣赏、开心的大事而得到他的宠爱，也因此，他对 4 1 4 越加反感。

是否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对 4 1 4 的反感，也就是他对全国造反派中温和、保守一翼反感的真情表露？

## 2、毛泽东认可的“四不”方针让两派都失望之极

从百日大武斗爆发的那一天开始，团派和 4 1 4 都盼望着中央早日表态和干预。当然，双方所盼望的表态是各不相同的。

毛泽东对武斗的态度，从中央文件和公开讲话中看，他向来都是反对的。这次召见讲话中，他也说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他接着马上就说，“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因为他认为“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

所以，毛泽东并不是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武斗都一贯地坚决地无条件地反对的。在他认为需要“治”的时候和地方，他强调反对武斗、不许武斗。在他认为需要“乱”的时候和地方，他是默许武斗、纵容武斗、甚至想法搅乱。乱与治，都出于他的政治需要。

清华的百日武斗，正好处于毛泽东希望文革全局由乱到治的过渡时期。因此可以看到中央在清华武斗的前期和后期，执行着两种不同的方针：

高校学习班结束前后，北京市的一些高校已经爆发了武斗。北大发生武斗后，中央迅速表态了。这一表态，积极意义是北大武斗表面上被制止了，而非常坏的负面影响是为得到中央支持的强势派蓄意挑起武斗逼中央表态加速打垮弱势派起到了示范作用。

毛泽东在召见时说：“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我不知道得到他认可的“四不”方针，北京市是何时出台的。我估计出台时间是在北大武斗之后清华武斗之前。这从北京市对北大清华武斗的不同态度就能看出端倪。这一方针，起码一直持续到 6 月底。这也解释了，在武斗初起的 5 月上旬，北京市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一个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由韩爱晶、王大宾等来清华调查武斗，但是，“因为谢富治支持不力，吴德不认真落实等原因最终失败。”

谢富治、吴德是知道毛泽东同意他们提出的“四不”方针，所以不会违背毛泽东的意志去

做强力制止清华武斗这样既不讨好又很吃力的傻事。

到1968年7月初，毛泽东对全国近似内战的武斗局面已经不能容忍了。再这样下去，文革就要失控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真的想“治”了，再也不想继续“乱”下去了。《七三布告》115的发布就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于是，7月15日，谢富治等北京市领导要求蒯大富停止武斗、上交枪支116。这实际上是上层对蒯大富的严重警告，也是给蒯大富以最后的机会。

对于上层在清华百日武斗期间前后期所采用的两种不同的方针（“四不”方针是只能感觉没有明示的），清华两派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 团派方面

武斗爆发前的4月22日晚，新航空馆里“一场空前严肃的（团派）总部会议召开了，中心议题是清华要不要武斗。一些人坚持要打，他们列举了许多例子，指出，敌人已经磨刀霍霍，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会场议论纷纷，显然主战派占多数。……会上，也有人117这样认为：‘中央对清华两派的斗争始终不表态，可我们不能总是这样与414僵持着，也许只有武斗才能迫使中央尽快对清华问题表态。’”蒯大富说：“清华武斗之前，北大3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蒯大富又说：“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显然，挑起武斗，逼中央表态，用中央的表态压垮414，这就是团派挑起武斗的目的。

什么样的表态是团派期望的？我猜测：要是中央表态说414是挑起清华武斗、破坏革命大联合、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已经由一个右倾保守的群众组织沦为被“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所操纵的反动组织，那么，把414彻底压垮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团派有这样的指望，并非是白日做梦。根据以往江青、谢富治等大人物对团派坚决支持的态度，参照北大的先例，不少团派人士估计武斗打起来以后，快则一两天，迟则三五天，中央就会表非常有利于团派的态了。对此，团派信心满怀。

事实上，团派可能得到的中央表态比他们所期望的要大得多。毛泽东在召见中讲了“我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这是货真价实的最高指示啊！远非1967年4月蒯大富曾经拼凑“414上台，不行！”那样有水分的“最高指示”可比。这个“414是反对我的”最高指示，对414的杀伤力，犹如立即处斩、就地正法的死刑宣判一般，顷刻间，414会作鸟兽散。可惜的是，这一最高指示发表的时间晚了点，恰如马后炮，对团派已经没多大的帮助了。要是在武斗刚开始的时候，或者在武斗期间，甚至在七二七前的十几天发布这样的最高指示，团派发动武斗、求助于中央表态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

武斗挑起来了，令团派大失所望的是，中央也好，毛泽东也好，对清华的武斗一直没有表态。

可能蒯大富也不知道中央不表态是因为此时正在执行着“四不”方针，他没有认真地琢磨中央不表态意味着什么。团派既没有利用“不表态”不计后果地疯狂进攻414（各种条件所限也是重要原因），也没有因为“不表态”退而停息武斗（可能骑虎难下吧）。就这样，在占优的局面中与414打打停停地胶着着。

到了7月份，眼看414已经被逼上悬崖，这个时候，中央出台了《七三布告》，始终偏袒蒯大富的谢富治也开始叫停武斗。团派对此是极不情愿的。118明摆着，这样做给414有喘息的机会，不让团派取得眼看就要到手的最后胜利。

总之，团派对中央在百日武斗中前后两种方针和态度全都没看懂，全都不满意。

#### 414方面

在武斗爆发之前，那时我还在学校里。414总部开会和头头们底下议论的时候，说的最多的都是“如何应对武斗”。也在如何应对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在科学馆内安装铁门，加强“李文忠学习班”的训练等。实事求是地说，414对于如何防止武斗想得很少，说得很少，做得很少。我与绝大多数头头一样，都感觉到武斗将一触即发，无法避免，应对武斗是当务之急。

414从来就没有讨论过“要不要武斗”的问题，因为“要不要武斗”的决定权不在414方面。414深知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都站在团派一边，414要是挑起武斗只能招来棍棒格杀，自取灭亡；只能引来包括414群众在内的广大师生员工的严重不满，众叛亲离；只能让团强四弱的局面更为不利，雪上加霜。要说414想维持分裂的现状，拖着，以求将来联合的时候筹码可以更重一些，这样的想法是有的。但是想从武斗中捞取政治上的好处的想法是没有的，也没有什么好处可捞。414真的不想武斗，不能武斗。因为政治上打不得，实力上打不赢，武斗对414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一个小小的火星就会引爆炸药桶的敏感时刻，414做了一件错误的、不明智的事情：抓斗陶森。团派认为抓斗陶森触及了他们的底线，是引爆武斗的导火索。团派可能找其他借口甚至谣言（如414在大礼堂藏匿了“480根长矛”）来挑起武斗，但是抓斗陶森实在是414以自己的错误给了团派挑起武斗的口实。4.23武斗终于爆发，演变成百日大武斗。

414在武斗中对中央的态度，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些过程：

先是失望。武斗爆发以后，以“救火大队长”著称的李钟奇副司令员不再来清华“救火”了。海军宣传队撤离清华了。北京市革委会就清华武斗发表了一纸无力的声明后再无实际下文了。种种迹象表明，清华爆发武斗以后，情况十分反常，负有责任的上层竟然都成了“围观者”，谁也不来管清华的死活了。414寄希望于中央和北京市出手制止清华武斗的希望落空，感到深深的失望。

继而丧失信心。本来以为，这场武斗“发生在首都，发生在毛主席的身边，终究不会打大，打久，中央不会长期不闻不问”。但是，都打了一个多月了，经过5.30大战，双方都死了好几个人了，上层依旧不闻不问。414对上层干预武斗已经一点点地失去了信心，前途感到十分渺茫。

接着是愤慨。等到武斗进行了两个多月，七月上旬，那几天，每天都有414的人被团派的冷枪射杀。这都是《七三布告》发布以后发生的惨案。414的情绪极度悲愤也是极度愤慨。抬尸游行是超乎常理的行为。但是，除了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向中央表达请求立即制止清华武斗的十万火急的心情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比这更合适更理智的方式呢？414是多么祈望《七三布告》能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啊！

最后是绝望。当救援科学馆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以后，414陷于绝境。救又救不了，撤又撤不出，连一向意志坚定的沈如槐也产生了“只要科学馆的战友安全突围，我们就立即撤出清

华”的念头。我相信，七二七前的最后几日，414在绝望中的坚守，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度日如年，只好听天由命了！

如果414因为失望、绝望、愤慨而被激得完全丧失了理智，采用血债要用血来偿还的报复手段对付团派，那就正好应了毛泽东“暴露坏人”的预言，414肯定会落得个被当做土匪一样歼灭的下场。

所幸414在百日武斗中一直坚守防御的立场，而且是纯粹的消极防御。这明显与军事原则不相符的。在军事上，即使是防御，也应该是积极防御，在防御中抓住有利战机进行反击，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但这是派战，是武斗。既然被迫参加了武斗，唯一可行的就是以消极防御表达不愿武斗的意愿和不屈从团派挑起武斗的意志。

清华发生残酷、血腥、长达百日的大武斗，团四两派都有责任，但最大、最主要的责任是在上层，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责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包括清华在内的全国各地的武斗，究其总根子，全在于文革的理论和文革的发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宣扬的谁的拳头硬谁就有发言权的斗争哲学，以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革命经验都为武斗埋下了种子。他纵容暴力夺权，江青鼓吹“文攻武卫”，都造成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局面。其次，要不是他采用了令两派都失望都不满的“四不”政策放任清华武斗，近在他眼皮子底下的清华即使发生武斗，也是完全能制止得住的。

### 3、毛泽东为什么没把七二七行动预先告诉蒯大富

几十年来，令团派最想不通并且一直纠结着的疑团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没把派工人来清华制止武斗的决定预先告诉蒯大富。

蒯大富说，“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来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此话，我完全相信。要是预先知会一声蒯大富，团派对工人宣传队所表现出来的欢迎程度，起码在表面上绝对不会逊于414。

蒯大富认为对他封锁如此重大的消息是一个阴谋，一个“可能是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的阴谋。

就在几年前，我参加过一次团派头头和骨干的小型聚会，他们还在继续孜孜不倦地追寻这一历史的真相。七二七那天，团派遭遇了灭顶之灾，他们想弄明白团派究竟是“死”在谁的手里的。

由于七二七这一历史事件的全部真相还没有揭秘，对于毛泽东为什么没把派工人来清华制止武斗的决定预先告诉蒯大富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猜测。我也是。

七二七这次行动的决策、实施过程，韩爱晶是这样说的：

1968年7月的某一天，“毛泽东问机要员谢静宜，怎样看待校园的武斗？谢静宜当即表示反对武斗。毛泽东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组织工人去清华大学宣传中央《七三布告》，制止武斗。谢静宣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分头做准备工作。还让原来在清华工作过的海军干部去团派总部要来清华总平面布置图。……毛泽东亲自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毛泽东蹲在地上，俯视清华平面图，他用大手在图上指示工人从南门、西门、东门分别开进清华。7月22日、7月25日，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先后两次组织一些工厂群众专

门去清华大学周围游行，呼口号。……7月26日晚，8341部队牵头，北京卫戍区配合，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集61个工矿企业负责人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和8341部队军管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任务是宣传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119，制止武斗，拆除工事。”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

1、这件事情的筹备过程有好多天，具体参与筹备的也有好几个人。七二七行动并非是心血来潮的临时决定，也非个别人知晓的秘密行动。

2、毛泽东是七二七行动的最高统帅。原则大事，如哪个单位牵头，哪些单位配合、派多少工人参加、怎么进清华、现场哪些人指挥，这些都是在毛泽东那里决定的。

3、毛泽东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对于区区三万工人进清华的一次行动，毛泽东没有掉以轻心。他蹲在地上指点地图的架势，不亚于他当年指挥百万雄师的三大战役。这不仅是为了过一把久违了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瘾，还因为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通过制止清华的武斗来达到平息全国武斗的目的。

4、为此，毛泽东打破惯例，反常行事：（1）派工人去制止武斗。往常北京市发生了武斗，都是由卫戍区派解放军去制止。如果仅仅为了制止清华的武斗，遵循常例就是。蒯大富既不会开枪抵抗解放军，清华武斗也一样能被制止。以往的经验告诉毛泽东，那样只能解决清华一时一地的武斗问题，不能解决清华武斗的根源问题，更不能解决北京和全国范围的武斗问题。毛泽东是着眼大局的。他派工人去制止武斗，这样的方式是过去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完全出人意料。（2）派出了三万之众。三万工人与五六百人的武斗人员，几乎是50：1的绝对优势。三万工人涌进清华，因为武斗而空旷的清华园里将满地都是工人，区区几百个武斗人员立即会陷入工人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那架势，工人不是来论理的，而是以多压少硬做的。识时务的，和平解决；不识时务的，就强迫解决。无论团派还是414，只许服从，不许讨价还价。（3）由8341部队指挥，卫戍区参战，海军宣传队带路，主体是工人。军民一体，各自发挥优势。

一旦以这样的非常手段、非凡魄力解决了清华武斗的老大难问题，再通过大规模的舆论宣传，那么北京其他发生武斗的高校，全国还在发生武斗的地区，都能正确无误地接收到伟大领袖下决心要解决武斗的信息了。解决清华一个点，影响全国一大片。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非常规的手段，才会有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效应和震慑各地造反派的强劲威力。毛泽东确实想出了一着非凡的高招、妙招、绝招！

毛泽东拍板决定派工人去清华制止武斗的时候，有没有嘱咐有关人员给蒯大富打一声招呼呢？有三种可能：1、明确嘱咐通知蒯大富。2、明确嘱咐不要通知蒯大富。3、没有明确交代要不要通知蒯大富。

1、要是毛泽东明确向某人交代要预先通知蒯大富，我看没有哪个人吃了豹子胆敢贪污“最高指示”的。当迟到的蒯大富扑在毛泽东的怀里恶人先告状，对毛泽东哭诉“杨、余、傅黑后台操纵十万工人，严严实实地把我们清华包围起来了，分片包围，学生跟他们讲理，工人就把学生拉到卡车上带走了”的时候，毛泽东听了，马上就问谢富治、温玉成：“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接着毛泽东又马上追问：“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从这两个细节中可以看出，要是毛泽东事先交代过要通知蒯大富而该人有意或无意遗忘了的话，毛泽东肯定会追问个水落石出、责备此人的。即便是周恩来，我想毛泽东也不会放过。如果有人真的忘了通知蒯大富，看到事态发展到这样严重，龙颜已经震怒，即便不是吓得屁滚尿流，

肯定早就心惊胆战，赶快坦白请罪的。所以，毛泽东明确交代了要通知蒯大富而经办人故意隐瞒不通知，故意要让蒯大富犯一个大错误，我认为这样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样的“阴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2、毛泽东明确交代不要预先通知蒯大富的可能性也是极其微小的。难道毛泽东有意要测试蒯大富的应变能力？果真这样，当然是没有哪个人敢泄露天机偷偷通知蒯大富的。

3、最大的可能性是毛泽东根本就没想到要不要通知蒯大富这码事。这非常符合毛泽东的办事风格。他向来是只抓大方向，不过问细节的。

尽管毛泽东没想到要通知蒯大富，但是他对蒯大富是有基本估计的。《井冈山报》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4 1 4挑起了清华武斗，蒯大富只是没有能力平息武斗而已。他相信蒯大富会欢迎工人制止武斗的。

毛泽东认为：“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这样非同寻常的声势，以及通过各种形式给蒯大富“间接打了招呼”，本来很聪明很机灵的蒯大富应该用不着费太多的脑筋就能想得到工人是谁派的。

毛泽东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的蒯大富，已经蠢到失去了最起码的判断力，蠢到没一点智商了。毛泽东太相信蒯大富了，结果看走了眼了。毛泽东对自己也太自信了，以为三万工人一到，两派定会夹道欢迎，武斗立马停止，人们山呼万岁。所以，在策划七二七的时候，毛泽东根本就没有“万一蒯大富抗拒工人怎么办？”的应对预案。

一方面毛泽东很想帮蒯大富，给他梯子下。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学生领袖、造反派头头，想通过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测试他们的政治智慧，考验他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既锻炼他们，考验他们，也测试、甄别他们。这也不能完全排除的。

如果毛泽东是这样的态度，那些知道七二七行动的中央要员，在要不要通知蒯大富的问题上，就要大费脑筋细思量了。

8 3 4 1部队的负责人，与“清华井冈山”素无交往，没有义务要预先告知蒯大富。8 3 4 1是“御林军”，其地位是“清华井冈山”不可能相比的。谢静宜、迟群1 2 0等人“根本不把蒯大富放在眼里。……（他们）有心防止意外泄露。他们怕蒯大富知道了会严加准备，搞名堂不好办。”像迟群这样喜欢出风头、有政治野心的人，对这次行动要绝对保密才可能做到一鸣惊人。

北京市革委会的吴德、丁国钰，北京卫戍区的黄作珍、李钟奇等人，他们在这次行动中只是配角。而蒯大富“对于市革委会吴德、丁国钰根本不放在眼里；对卫戍区黄作珍的话不会听，更是藐视李钟奇等人”他们对蒯大富的张扬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他们心里巴不得蒯大富摔一个跟斗，哪会多嘴去通知蒯大富呢？

周恩来，从七二七行动的策划和操作过程来看，如果毛泽东完全绕过了他，他即使知道了这件事也绝不会插手，只会冷眼旁观。如果在七二七行动之前毛泽东告知了他，做事一向慎密的他对这样一件事情该涉足多深肯定把握得极有分寸。只要毛泽东没向他交代要给蒯大富打招呼，他是不会主动去通知的。何况他的内心对蒯大富也没多少好感。

估计江青等中央文革大员都没有参与策划此事。如果江青知道此事，即使毛泽东没有交代通知蒯大富，凭着江青对蒯大富的关爱，她是极有可能预先通知蒯大富的。即便事后毛泽东责怪江青多嘴多舌，江青倚着夫人的身份，或撒娇或撒泼，毛泽东对她也奈何不得。只因为江青没有参与此事，所以蒯大富这一最重要的援手没有发挥作用。

至于林彪及中央军委的大员们，似乎更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与他们关系不大的这件事。

所有预先知道七二七行动的中央要员中，唯有谢富治的处境最为微妙也最难受。蒯大富与谢富治的交情最好，对这样一个与蒯大富有极大利害关系的重大行动，谢富治从心里说是非常想通知蒯大富的。但是，谢富治在这次行动中同样并不是主角，他也仅仅是被知会了配合一下这次行动而已。毛泽东又没有向他交代通知蒯大富，他猜摸不透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不敢擅自泄密。要是仅仅为了讨好蒯大富而泄露了天机，招致毛泽东的批评、猜忌甚至责骂，那样做是完全得不偿失的。另外，谢富治在7月中旬几次要求蒯大富停止武斗，解除对科学馆的封锁。一向对谢富治比较听话的蒯大富，这次连谢富治的话也不听了。这让谢富治在毛泽东的面前说不响话了，谢富治心里对蒯大富也是不很满意的。所以，我想谢富治在七二七前的那几个晚上反反复复地前思后想，一定在为要不要给蒯大富透露点口风而纠结着。最后，权衡再三，还是没有通知蒯大富。很可能谢富治有侥幸思想，以为不预先通知应该不会出大问题的。没想到蒯大富竟然头脑发热到会开枪抗拒。

在召见现场，表现最反常的也是谢富治。蒯大富还没有来的时候，谢富治在毛泽东面前两次都说是蒯大富“不肯来”，“（这连）韩爱晶（都）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蒯大富后来说：“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这样一个与他政治生命攸关的重大信息，有不少人（如吴德）可以告诉他，有一些人（如谢富治）应该告诉他，却都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这谜底蒯大富即使想一辈子恐怕都难以猜中了。

对于七二七这件事，蒯大富先后怀疑有两个阴谋。一开始怀疑的是黑手背着毛泽东操纵欺骗工人镇压团派的阴谋。这个阴谋在毛泽东对蒯大富前后说了四五次“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以后，蒯大富不得不打消了。紧接着他怀疑另一个阴谋，那就是工人确是毛泽东派出来的，但是在这过程中有黑手从中作梗，玩了花招，设下圈套“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这“阴谋说”几十年来，始终困扰着蒯大富无以解脱，始终是一个“没想明白的疑惑”。

我想对至今还在钻研和破解“阴谋说”那些团派朋友真诚地说一声，别钻这个牛角尖了。蒯大富的知心好朋友韩爱晶说：“知情者没人真心想帮蒯大富，也没人想告诉他内幕。……（这都是）由于蒯大富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恶性膨胀走向反动。”诚哉斯言！清醒的旁观者一语中的！“全身浮肿”的蒯大富首先是被自己打败的。骄横不可一世的团派也是被自己打垮的！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mailto: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 (WWW) 地址: <http://www.cnd.org/>

---